

从考古材料谈长城的起源

□ 张长海

长城作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一个既具防御功能,又具象征意义的遗迹,从分布上看,是一条线的概念,但从历史文化内涵来看,又是一个带的概念,即所谓“长城地带”。它的文化内涵不仅体现在燕、赵、秦、汉、明,而是可追溯到数千年前甚至更久远的年代。因此,要揭示长城的起源就必须追溯到史前时期。本文就是通过对目前长城地带所发现石城聚落的考古学研究,得出长城是由上述地带发现的石城聚落发展而来的,长城就是放大、延续、串联起来的这些石城聚落,最终形成烽燧相望、敌台林立的、延续的巨大防御工程。从石城聚落至长城的完全形成经历了发生、发展和形成的三个阶段。

早在20世纪80年代,苏秉琦先生就提出“原始长城”^[1],他是最早把石城聚落作为长城起源的人。之后,西北大学的钱耀鹏提出了内蒙古中南部的石城址为长城原型初现的观点^[2]。沈阳故宫博物院的姜念思提出了长城起源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石城聚落^[3]。下面就对长城地带目前发现的石城址从分布、特征、聚落形态及其发展来探讨长城的起源。

目前,长城地带共发现三处相对密集的石城址的区域,即内蒙古中南部、陕北和内蒙古东南部。

内蒙古中南部:主要分布于三个地区:一个是凉城岱海周围,多分布于蛮汗山南麓向阳的坡地上,面向岱海及岱海相连的开阔盆地。有老虎山遗址^[4]、西白玉遗址^[5]、板城遗址^[6]、大庙坡遗址^[7]。它们同属老虎山文化,距今4800~4300年;包头大青山南麓,均位于大青山南麓的台地上,前临土默川,隔川与黄河相望。有威俊遗址^[8]、阿善遗址^[9]、西园遗址^[10]、莎木佳遗址^[11]、黑麻板城遗址^[12]。属阿善三期晚段,距今4800年左右,淮格尔旗与清水河之间黄河东拐南下之处,多分布于黄河岸边的高台地上。有白草塔遗址^[13]、寨子塔遗址^[14]、寨子上遗址^[15]、小沙湾遗址^[16]、后城嘴遗址^[17]、马路基遗址^[18]。

它们的特征从分布上来看,多以个体城址出现

并呈线状分布。如岱海石城址,从西南向东北为西白玉遗址—老虎山遗址—板城遗址—大庙坡遗址;大青山南麓石城址,从东往西为阿善遗址—西园遗址—莎木佳遗址—黑麻板城遗址—威俊遗址。且它们之间的间隔为5公里,从选址来看,石城址均依地形的起伏而起伏,在地形险要处,如山崖陡峭或河边断崖处不筑石墙,从石城址建筑结构来看,墙基多建在生土上,或以夯实的黄土为基础,或挖有基槽,墙体以大小不等的石块错缝叠筑,中间以碎石和黄土填充,局部因无土而全用石块,为防止石墙倒塌,个别地方墙外辅以石堆,这可能是马面的雏形;从功能上看,个别石城有与城址有关的祭祀遗迹,除淮格尔、清水河黄河两岸未发现能确认的祭祀遗迹外,如大青山前威俊遗址、黑麻板城和莎木佳城址内有“回”字形祭祀遗址,岱海地区的板城遗址外有祭祀遗迹,老虎山和西白玉城址在山坡上有小方城,除有瞭望功能外,亦可能与祭祀有关;从城内的房屋布局来看,按等高线分阶地建筑。此外,这里的石城聚落址多以个体形式出现,也有两三个石城为一组的群体,如威俊遗址、阿善遗址、莎木佳遗址。但城址之间的依附关系还不明显。

内蒙古东南部:分布在河北承德至辽宁朝阳以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范围内,以赤峰市阴河、英金河沿岸的石城址^[19]最为典型。

其特征:石城址均依地形起伏而建筑,在地形险要的一侧不筑墙。如新店石城只在北、东两边缓坡建墙,南、西两边利用山崖不建墙;石城址往往沿河流成线状分布,按大、中、小规模成组、成群分布;从石墙建筑结构来看,墙基多建在生黄土上,其上以大小不等的石头错缝叠砌石墙,石缝之间填充碎石块或黄泥,如西山根石墙,在这种城墙外侧发现有半圆形的用石块垒砌的间距不一的附属建筑,其功能是加固城墙,重要之处是突出于墙外,使攻城者三面受敌,以增强防御,酷似后世城墙的“马面”或长城上的

“垛台”,如新店石城址,城内房址布局,均分阶地而建,阶地之上房址沿坡成排排列,如西山根城址,祭祀遗址在许多石城址内多有发现。

陕北地区:主要发现于陕西省榆林市的无定河、大理河和清河沟流域。发现的遗址有清河沟北岸的关胡疙瘩遗址、后寨子峁遗址、冉和峁遗址、高家梁遗址,大理河的横山金山寨、魏家楼、子州崖窑坪等20余处。根据调查这一区域普遍存在石墙、积石堆一类遗迹^{[20][21]}。时代属仰韶文化晚期至龙山时期。

其特征:依河流走向呈线状分布,随地形起伏而建,在自然断崖或陡坡处不筑墙,建筑结构是墙体两侧用石块垒砌中间填以坚固的黄土,如后寨子峁遗址,有的由2~4层单排石墙相贴而成多层墙体,如关胡疙瘩遗址,墙体外侧用石块成护坡,城内房址依等高线成排成组分布。

综合上述三处石城址的特征:它们都分布于“长城地带”,都具有防御功能,与后世的长城位置基本吻合,内蒙古中南部与战国赵长城、陕北与秦长城、内蒙古东南部与燕长城基本一致,它们都是人工建造,并呈线状、成串、链条式分布的防御性设施,从选址、石墙建筑结构来看,皆因地制宜,随地形起伏而建,险峻的地形不筑墙,而是利用这样的地形作屏障。就地取材,或以石块垒砌,或以两侧石块垒砌中间填以黄土,墙体外侧有用石头垒砌,类似后世城墙的马面或长城的垛台。这些特点与后世的长城在分布区域、选址、墙体建筑结构、防御功能等方面基本一致。说明这些石城址和长城之间有渊源的关系,即长城就是起源于分布在长城地带的上述石城址。

下面从以上区域石城址的聚落形态及其发展来分析长城的起源。以上石城址的出现是聚落形态发展史上一次质的飞跃,也是一定历史阶段和社会发生剧烈变革的一种显著反映,是一种空前未有的设防工程,它的出现不一定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人们为了保护生存空间、资源而采取的防御措施。上述三处石城址也不例外。它们的形成过程就是上述理论的真实反映。距今8000年的暖热期^[22],即中原仰韶文化中晚期,中原的考古学文化在生产力、人口数量等方面得到发展,势力急剧膨胀,结果向四周扩展,形成人群的流动。其中的一支来到内蒙古中南部——河套及岱海一带进行殖民式拓荒,在这种环境下不同人群的交流 and 碰撞就无法避免,再加上自然环境的影响,使得各文化人群就

必须在对抗中求生存,该地区的石城聚落就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应用而生的。这时期的居民仍然以农业生产为主^[23],同时农业也就成为他们生活的主要来源,定居就成为必然,带来的结果就是限制了人群选择居住的范围,随着农业生产和定居时间的推移,人群就加强了对生产和居住地的依赖,进而导致了人群领域观念的空前高涨。基于对这种土地高度依赖进而产生浓厚的领域观念,失去土地就等于失去生存的先决条件,使得捍卫领地成为他们始终坚定不移的首要任务。这样人们就产生了同黄河中下游龙山文化普遍存在的守土卫族思想^[24],如内蒙古中南部石城址和陕北石城址人群守卫的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盆地或河流岸边或岱海周边。“守土卫族”也就成为长城产生的最初思想基础,再加上内蒙古中南部和陕北的石城址与后世长城在物质形态上的一致性,因此,内蒙古中南部和陕北石城址就成为后世长城的原型。

内蒙古中南部和陕北的石城址分布较松散,其间的关系也不甚明确,虽说有个别大的聚落,但作用不甚突出,形成大聚落群的趋势是刚刚出现,另外,城址的内涵相对不复杂,虽说有老虎山遗址靠近石墙发现埋葬简陋的墓葬和园子沟遗址灰坑埋人的现象,但这只是个别现象,内部分化不甚明显,房子布局往往具有凝式和同心式结构的特点,与一般乡村聚落没有太大的区别。石城址基本是以单个形式出现,但也有二、三一组的城市群。总之这时期的城址应与仰韶时期一村一寨为独立生活的情况相近,这些石城址的防御往往是各自为阵,各自守卫着自己的生存范围和“家园”,以个体氏族部落的形式出现,这时的社会形态应是由氏族部落向“古国”过度或刚刚进入“古国”阶段,也就是苏先生提出的“古国—方国—帝国”中的“古国”阶段。

距今4300年前后的降温^[25],使老虎山文化走向衰落,所说的人群丢下他们曾经居住的石城,向南或向东去寻找更多的可利用资源。此时人群的运动模式由此前的拓荒性殖民式移民变为竞争性迁徙,向东的一支逐渐融入到了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人群当中。以赤峰英金河、阴河流域为代表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址和内蒙古中南部石城址之间在选址、石墙的建筑结构、城内房址的布局以及与城址有关的祭祀遗迹的继承关系就证明了老虎山人群东迁的观点。内蒙古中南部石城址聚落的布局和他们之间的主次关系说明各聚落在防御方面还拥有较强的独立

性,那时的聚落群内部似乎未能实现统一,或在结合、一体化的道路上所迈出的步伐还很有限。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聚落群内外部力量的长期作用和影响下,聚落群内部一体化程度势必会有所加强,聚落群同盟性质的社会现象就会出现,此时的防御体系就会发生较大的变化,超越单个聚落范围内的防御体系就有可能出现。当超越聚落、聚落群更大规模的社会集团形成之后,其防御体系就会由简单形式演变得更为复杂起来,其中单一聚落城址的防御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就不能直接全面地反映社会集团的整体防御体系。如内蒙古东南部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石城聚落群较老虎山文化石城聚落在防御体系性和层次上的表现就更加强烈。夏家店文化的石城址聚落群之间有大小之分,而且在一定范围内组成从小到大呈“金字塔”式的聚落群布局结构,即小型多、中型少,大型仅一、二。如英金河石城址聚落群由西向东可分为三组,其中都有大、中、小三种类型,每组中都以小者为多,中型有一、二,大型只有西组一座,中大型都处于聚落群的中心位置。这样英金河石城聚落群就形成了以西组为中心,中和东组成为其外围防御体系。从更大地理范围来看,夏家店下层文化半箭支河流域的聚落群同英金河流域同时期的聚落群相比,其位置结构一致,但各组规模都比英金河流域的大很多,像英金河流域石城址这样的规模,还分布于以半箭支河中游为中心的方圆百公里的范围之内,这样就形成了更大范围的有中心群体和外围群体的石城址聚落群。所以设在边缘地带的成串石城址群不是为了保护一座城,而是整个聚落群防御体系的有机联系,是为了形成更大范围的防御,即“国家”的集体防御。城堡带以内保护的是“我方”,抵御的是“敌方”。这样的防御规模和层次绝不是保护单个城邦国家,而是称霸一方的“方国”。这就是本文叙说的长城的发展阶段。最初的“古国”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不高以及集团规模较小而人力物力有限,单个石城只能防御有限的范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组织的形成,石城址聚落群保卫的范围也越来越大,到秦帝国形成之后,保卫己方的防御工程就更加庞大,于是就产生了把战国时期秦、赵、燕各诸侯国长城串联起来的万里长城,在一定时空范围内,长城就是极限防御的具体表现。这就是长城的形成期。

上述三处石城址几乎都未走上城乡发展的道路、发展成为真正意义的城市,主要是自然条件的

限制,一直处于一个动荡的环境当中,因此这一地带的石城址存在的意义从形成之时就带有浓厚的军事防御色彩。随着时间的推移,到西周小冰期来临时^[26],北方民族的生业形态由畜牧业代替,之后进入了以骑马术为标志的半游牧阶段。马作为作战工具的出现影响了中原和北方人群的巨大转变,使得北方人群全面游牧化,同时,也是“华夏”认同的形成和强化^[27]。这样长城地带间的两大人群掀起新一轮的资源争夺战。为防止北方游牧人群的南下,中原的统治阶级根据北方地域辽阔、地形复杂的特点,认识到若“屯兵戍守,寡则艰于应敌,多则困于传输”,“北狄……所长者野战,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短夺其所长,则虽重不能成患,虽来不能内逼”,于是纷纷北筑长城。首先处在最北的三个国家——秦、赵、燕修建了长城。之后,秦始皇统一了六国,为抵御北方的匈奴在原有长城的基础上修建了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

长城经发生、发展到形成,经历了古国、方国和帝国三个阶段,虽然在各自所处的阶段不同,表现的形式不同,所要保护的范围大小也不同,但防御的内涵却贯彻始终。

[1]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9年。

[2] 钱耀鹏《中国史前城址与文明起源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

[3] 姜念思《长城起源的考古学考察》,《中国文物报》,2006年8月25日。

[4] a.田广金《凉城县老虎山遗址1982~1983年发掘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1986年第4期。b.田广金《内蒙古中南部龙山时代文化遗存研究》,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内蒙古中南部原始文化研究文集》,海洋出版社,1991年。

[5][6][7] a.乌盟文物站凉城文物普查队《内蒙古凉城县岱海周围古遗址调查》,《考古》1989年第2期。b.田广金《内蒙古中南部龙山时代文化遗存研究》,内蒙古文物研究所编《内蒙古中南部原始文化研究文集》,海洋出版社,1991年第1版。c.田广金《内蒙古长城地带石城聚落址及相关诸问题》,载张学海主编《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齐鲁书社,1993年。

[8] 刘幻真《内蒙古包头威俊新石器时代建筑群址》,《史前研究》辑刊,1988年。

[9] a.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史研究所等《内蒙古包头市阿善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4期。b.包头

市文物管理所《内蒙古大青山西段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6年第6期。

[10][11][12] 包头市文物管理所《内蒙古大青山西段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6年第6期。

[13]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准格尔旗百草塔遗址》,载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第1版。

[14] a.魏坚《准格尔旗寨子塔、二里半考古主要收获》,载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内蒙古中南部原始文化研究文集》,海洋出版社,1991年。b.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准格尔旗寨子塔遗址》,载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第1版。

[15]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准格尔旗寨子上遗址发掘简报》,载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第1版。

[16]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准格尔旗小沙湾遗址》,载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第1版。

[17][18] a.田广金《内蒙古长城地带石城聚落址及相关诸问题》,载张学海主编《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齐鲁书社,1993年第1版。b.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清水河县后城嘴遗址》,载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第1版。

[19] 徐光冀《赤峰英金河、阴河的石城遗址》,文物出版社,1986年。

[20][21] a.《陕北惊现史前遗址 4500年前人类已大量修筑窑洞》,载《文汇报》2004年11月24日。b.《陕西东部南流黄河地带区域考古调查》,载《中国文物报》2006年8月4日。

[22] 张兰生等《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全新世环境演变》,载《全球变化与我国未来的生存环境》,气象出版社,1996年。

[23] 田广金、郭素新《早期中国文明——北方文化与匈奴文明》,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

[24] 曹兵武《中国史前城址略论》,《中原文物》1996年第3期。

[25] 王苏民等《内蒙古岱海末期冰期以来的环境演变及古气候》,《第四纪研究》1990年。

[26] 张兰生等《环境演变研究》,科学出版社,1992年。

[27]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4月。

(作者工作单位: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文征明行书《滕王阁序》